

文艺史学与文艺科学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七月上海初版

風

文藝史學與文藝科學一冊

Literargeschichte und
Literarwissenschaft

定價 國幣 陸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原作者
譯述者

Werner Mahrholz

李長之

發行人

朱經農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須

譯者序一

友：這些時候老沒見你，你忙什末了？

我：我正忙一部譯稿。

友：是誰作的？原名是什末？

我：作者是瑪爾霍茲（Werner Mahholz）。書名是文藝史學與文藝科學（Literargeschichte und literarwissenschaft）。

友：是德文的麼？你偏喜歡德國人寫的那樣沉悶而冗長的著作（他笑了）。

我：你只知道德國人著作的壞處，你沒看到德國人著作的好處。

友：好處在那裏？你快說給我聽！

我：要說那好處，一句話還說不完。簡單說至少是周密和精確，又非常深入，對一問題，往往直搗核心，有形而上學意味。幽默，輕鬆，明快，本不是德人所長，我們也不求之於德人著作呢。

友：你倒會給德人迴護；可是我不懂：同樣內容，假若寫得很通俗，很有興味，讓人很容易接受，難道不比寫得佶屈聱牙，讀了讓人頭痛，拒人於千里之外好些麼？

我：這個當然，只是問題就在內容不同。

友：可是我又不懂了，爲什末講文學也要什末周密而精確，也要什末形而上學意味呢？

我：這很簡單。文學的創作是一件事，欣賞又是一件事，研究別是一件事。創作靠天才，只要那有創作的才能，隨你怎末寫。就是那死板板的老頭兒康德，他對於創作的天才也沒有辦法，他不是只好說天才是立法的，是給出律則來的，但卻並不是律則的奴隸麼？欣賞也有你的自由，任何人沒有欣賞自己所不喜歡的作品的

義務。研究卻不同，研究就要周密，精確，和深入。中國人一向不知道研究文學也是一種「學」，也是一種專門之學，也是一種科學。關於數學的論文，一般人看了不懂，不以爲奇怪；爲什末看了關於文學的論文，不懂，就奇怪呢？

友：你像是給我讀書一樣了。最低限度，我很欣賞你這樣像煞有介事的態度。那末，你就是希望把文學論文變得和數學論文一樣了？

我：當然！所以叫文藝科學麼。厄爾瑪廷格(Ermatinger)曾經輯了一部文學科學之哲學(Philosophie der Literatur Wissenschaft)，這書是由專家分別執筆的，厄爾瑪廷格自己也有一文在內，他稱爲文學科學中之律則，他還有好幾個公式呢！

友：那末讀者一定很少。

我：這沒有關係。科學上的真理並不一定依聽衆多少爲高下，科學家也從不顧及這方面。一篇氣象報告，普通讀者雖不看，研究氣象的人總要看。文藝科學的論文，也是寫給研究文藝科學的人看的呢。

友：那末，豈不是和大衆脫節了嗎？

我：話不能這麼說。你所謂和大衆接近的一部分也仍然有的，那是「文藝教育」。但是文藝教育須以文藝批評爲基礎，而文藝批評卻根於「文藝美學」。文藝美學的應用是文藝批評，文藝批評的應用才是文藝教育。像物理一樣，有理論物理，有應用物理。假若就理論一端講，那自然是和大衆絕緣的；可是就應用一端講，和大衆又何嘗不相關？二者原是一事，不過爲培養學者的獨立而深入的研究精神計，讓他研究理論時不必顧及應用，這樣，他便可以不必安於小成；但等到一旦應用時，卻一定應用得更便利，更普遍了。

友：你的話也很有道理，不過我不愛看理論太艱深的書；尤其關於文藝理論的。——我覺得不值得！

我：這自然不必勉強。只是我覺胃口儘管軟下去，也不好。酥糖之外，吃點綠豆，讓牙齒也用點力，豈不也很有趣麼？俗話說：「船多不礙江」，學術上原不必定於一。我覺得中國人現在最需要的胸襟，就是要能

夠虛心容納不同於自己的立場，並虛心欣取不同於自己的趣味。「既生瑜，何生亮」的態度，要不得。通俗書之外，也可以讓許多專門書存在；專門書之中，也可以讓種種不同的書存在。歌德說得好：「對於能夠鑽研的，要竭力鑽研；對於不能夠鑽研的，要懷了敬畏。」世界這末大，爲什末限制自己呢？

友：好，我現在就不限制你這部翻譯的專門書的存在了。

我：謝謝你這好意（我笑了）。可是我還要糾正你，我這部翻譯書，只能說中國一般讀者對它的內容不太熟悉罷了，它本身卻非一部專門書，它只是講專門的書的而已。

友：那末，請你把它的性質，告訴得我再詳細些。

我：關於它的性質，在著者的序裏，以及舒爾茲教授（Prof. Franz Schultz）的跋文裏，都說得很清楚。它是講近代德國文藝科學的潮流的，不過它不是散漫地去講，卻是就方法論的原理和知識論的基礎上而探討其內在的趨勢的。著者的主旨，第一是把這些種種不同的傾向加以敘述；第二是把那些在方法上的混淆與雜亂無章加以澄清；第三是就「文化政治」的立場上，對於學者的任務，加以說明。著者在講那種種的方法時，他沒有忘掉就方法的可能性上，尋出一個體系來；他講到每一學者的著作時，他也一定指出那哲學的出發點。他這部書原是爲外行人想知道這門科學的內容和演變，或別一門的專家因爲改行，而想得一點基本智識而寫的。這兩重目的，可說都作到了。

友：不看原書，對於你這話，恐怕也仍然不容易瞭然。可是也許和看電影一樣，假若先看說明，看起片子來就容易貫出了。你剛才告訴我的是書的性質，現在我請你再把內容告訴我個大概。

我：沒想到你有這樣大的興致。但作一個讓人明白的電影的說明可真不容易，我看電影，就從來不看說明。我不知請你看試片吧。

友：也好；那末，讓我隨便翻翻你的譯稿吧。（他拿過我的譯稿去。）原來一共是七章，有序，有跋，有年表，有附錄。（一邊看，一邊漫不經心地問我）一共好多字數？

我：一共二十萬字，算上註文。

友：你很 了些功夫（他試着入神地看了三兩段，我沒有打擾他。可是他搖搖頭。）不行，不行。看不出什末所以然來。句子太長，不知道的人名和術語太多！

我：困難是在意中的，你聽我慢慢告訴你這困難如何解決。句子長，我知道，但是沒有法子。我初譯時，未嘗不採意譯，也未嘗不採破長句爲短句的法子，可是當我最後的校閱時，我發覺了，那樣譯，錯誤最多，原文的光彩，也最易損失。有許多概念的統系和邏輯的結構，是非用長句不能表達的。假若論學也和應酬「今天天氣哈哈」一樣輕易，當然可以用短句。說實話，意譯比直譯容易得多，無奈那樣捕風捉影式的翻譯，在我自己的眼睛下，就先通不過了。同時，假若譯語太習見了，我們將無從獲得新概念、宏保耳特（Wilhelm von Humboldt）說，「一種新語法的獲得，是一種新世界觀的獲得，」假若語法如故，又何從獲得新世界觀呢？語言就是一種世界觀的化身，就是一種精神的結構，假若想豐富我們民族的精神內容，假若想改善我們民族的思想方式，翻譯在這方面有很大的助力。在某限度內的直譯是需要的。看理論書當然不同於看軟性小說，不費點腦筋是不行的，不字字注意而想跳過或滑過，是不行的。我又說到德國書的長處了，那長處就是讓人的精神一刻也不能鬆懈，緊張到底，貫徹到底，這是因爲否則就不能把握。這是一個最好的訓練啦。所以，我常勸人看德國書，至少也要常看德國書的譯文。

友：你有點巧辯。但我看你並沒解決了我的困難。

我：我的話還沒有完。其次，一般人看這部譯稿的困難還是在內容，就是你所謂不熟悉的人名和術語太多。關於這方面，我特地加了六萬多字的註釋，一共三百多條，其中二百多條是關於人名，其中一百多條是關於術語。假若你每達到註文時就翻翻，一定可以幫助你許多。而且，我的書後有中西文索引，每一人名或術語附着註釋的次第，所以，即使你一次看過註文不記得，在後文再遇到那人名和術語時，還可以借索引再翻一遍呢。

友：那末，你不啻附上一部文學小詞典了！

我：那正是我的主意。所以註文有長到數千字的，重要人物如歌德，席勒，萊辛，海爾德，重要術語如啓蒙運動，狂飆運動，古典，浪漫，巴洛克，高特精神，史詩，抒情詩，體驗等，都不厭求詳。每一條，我都盡可能地列上重要參考書，並提及國內已有的介紹。我不只希望人讀本文時翻看，而且讀其他文學書時也可參考，即使無事時翻着玩，也可以有所得。我相信其中關於史詩，劇詩，抒情詩，古典，浪漫，詩學，批評，文學史，體驗諸條，就目前国内出版物說，還沒有可以代替的。

友：我知道你這翻譯是用過心的。

我：用心不用心，我自己也不敢說，但是在消極方面，至少我作得不苟。剛才所說關於讀本書時的困難，註文固可以幫助解決一點，讀法也很重要。你不是看到全書一共七章嗎？頭三章可說自成一個單位，這是講歷史的發展的。這三章之中，每一章之末，都有一節回顧，對所敘事實，都很能提綱振領地重說一遍。所以，每到你覺得頭緒不很分明時，便可以重讀這三節呢。三國志演義上說，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我說文藝科學的進展也是如此，她的方法正是由綜合而分析，又由分析而綜合的。在第一「綜合」期，是惟心論哲學期，代表人物可以舉歌德，他是近代文藝科學的創始者，雖然影響並不太好。在第二「分析」期，是實證主義期，代表人物是舍洛 (Wilhelm Sedewitz)，他的勢力很大，這一派多半走入窄而深的研究。在第三重歸「綜合」期，便是新黑格耳主義期，也就是新浪漫主義運動期，代表人物可推遜爾泰 (Wilhelm Dilthey)，到現在也還是這一派的分派支流。這便是文藝科學上的三個大波瀾，也就是相當於本書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的。第四章卻是一種體系的說明，是專就方法論上的可能性立論的，完全爲第五章，第六章作一個地步。第五章及第六章就是在實際上看那前一章所說的方法論的可能性之如何實現。第五章的末一節，又是一個很好的綜合說明，對於了解近代整個的趨勢上，大有幫助。第七章卻是講近代文藝科學的徵兆及任務的。所謂徵兆，指古典人物之解體，這就是說，由於集團主義的抬頭，那個人主義的英雄偶像是消融了，但那些有價值的精神活動，

卻將普及爲一般人的財富。所謂任務，指德國處在戰後那樣艱鉅困乏的時代，肯定自我與意識自我爲刻不容緩之圖，文學史家便應該擔負起這種偉大的責任。

友：這樣說來，你這部翻譯，倒另有一種意義了。中國不也是處在艱鉅困乏的時代麼？中國不也是需要肯定自我與意識自我麼？這部書對中國文學史家也一定有所感發呢。

我：對呀。這也是我譯書的動機之一。

友：還有呢？

我：還有，我覺得中國的學者太懶，中國的詩人太不幸運。假若李太白生在國外，註釋家何至於少到三五人？評傳何至於鳳毛麟角？他的世界觀，人生理想，和美感，何至於還沒澈底發掘？我們看了人家談莎士比亞，談歌德，談薛德林，我們真慚愧得無地自容，我們讓死掉的詩人太寂寞，太冷清。人家的文學史，於經過一種思想上的主潮的洗禮以後，方法便大有變化，或走得更廣，或走得更深。何等豐富！何等燦爛！我們的學術史太單調，太空虛了。對於大的思想系統，在鑽研上太畏縮，往往給一悶棍，比方說：「黑格耳太惟心了」，一悶棍便把黑格耳打死了；又或者貼一個封條，例如：「柏拉圖有什末價值，統治階級的代言人！」於是誰也不許談柏拉圖，把柏拉圖的書束之高閣了。這樣將永遠不能深入，不能廣闊，不能豐富！

友：你又發難感了。

我：既然發起來，索性發下去。不能諱言，我們的學者是太懶的。其次是缺少方法，原因就在於不接受大思想系統。我們不需要點點滴滴的金屑，我們需要呂洞賓那個點金術的手指頭。我介紹瑪爾霍茲的書，即意在使人知道借呂洞賓的手指用用，所以即使對那細節目不很了了，也無礙。照西洋的方法，開中國的寶藏，這是這一代的中國人的義務。我再說中國學者第三個缺點吧，便是胃太弱，心太慈。因爲胃弱，所以不能消化硬東西，因爲心慈，所以不能斬鋼截鐵。治學要狠，要如老吏斷獄，鐵面無私；要如阿叱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要分析得鮮血淋漓；萬不能婆婆媽媽，螳螂捕蟬。所以我常說，應該提倡「理智的硬性」，我不贊成腦筋

永遠像豆腐渣一樣，一碰就碎。

友：你這部翻譯，一定是「理智的硬性」的代表了。

我：一點不錯，這是我愛這部書的惟一理由。你看他評論歌德，說了他的短處，再說他的長處；你看他評論舍格，說了他在學術史上代表進步處，再說他代表退步處；你看他論 R. M. 邁萊爾 (R. M. Meyer)，說了他某點可議，某點可議，某點可議，但最後仍指出他在某點是貢獻，在某點是貢獻，在某點是貢獻。他敘述一個人的著作，往往分析其在方法論上如何，在美學上如何，在文學史的進展上又如何。真正所謂條分理析，一絲不苟。不但瑪爾霍茲的本文如此，就是弗朗茲·舒爾慈教授的跋文也是如此。舒爾慈那跋文，更是一篇好文章了，我常不禁有超越瑪爾霍茲本書之上的感覺。只有像這樣瑕瑜並見，長短互論，條分理析，一絲不苟，才配談批評，才配稱科學。

友：但是我爲什末只聽見你說瑪爾霍茲的好處呢？

我：這是因爲他的壞處，已有舒爾慈的批評在先，我很同意，所以我不必加什末話了。

友：舒爾慈怎末說的？

我：說他重複，不調和，輕重之間，事先沒有佈置；而且嫌他太容易接受，幾乎除了語言學這一派以外，他竟都許其存在了。據舒爾慈說，這正是獨學者應有之失，正如他在別方面空無依傍，論列都新鮮而活潑，也正是獨學者應有之得呢。

友：瑪爾霍茲沒入過大學嗎？

我：不是；是說他因爲參加教育改革運動，而不會專心致志罷了。

友：你可否把他的生平多告訴我一些？

我：這裏正有北平中德學會的弗朗克博士 (Dr. Wolfgang Franke) 給我寄來的一份傳記，是採自瑪爾霍茲的另一名著德國現代文學 (Deutsche Literatur der Gegenwart) 的附錄中的。你看，這上面註着見原書五一八頁

——五二二頁，現在他是打了一全份給我的。照這上面說，瑪爾霍茲是一個多產的天才。他生於一八八九年十二月一號，他的名字是屋爾諾（Werne），他生的地方是柏林。他是他父親的第四個兒子，二歲父親就死了。他曾在明興大學和柏林大學習哲學，文學史，歷史，英法文學。瑞士和倫敦，他頗住過些時日，並且曾在牛津大學作過研究。他於一九一二年大學畢業，他的論文是關於「少年德國」一派的一個作家茅遜（Julius Moser）的，這或者是他第一部文學史的著作吧，這時他二十三歲。一直到他三十歲為止，他在明興過一個自由職業者的作家生活。這中間他到過意大利大會和法國，曾參加魏瑪板的歌德集的編訂。他在大學畢業後，又吸收了許多新知識，這就是經濟學史，國家經濟學，社會學，神學和教育等。這一期他著有自傳史（Geschichteder Selbstbiographie 1919），德國虔敬主義（Der deutsche Pietismus 1920），學生與高等學校（Der Student und die Hochschule）等，後者是討論教育改革的，為一般人所稱賞。大戰以後，他參加了許多有名的報館，一九一七年並創刊「高等學校」一雜誌。後來他實際作改革教育的活動去了，並在一九一八年加入了德國民主黨。因為政治的興趣的緣故，他那雜誌「高等學校」遂在一九一三年起，改為「政治與歷史專刊」，這時他三十四歲了。他的文學興趣卻仍在發榮滋長，文藝史學與文藝科學即作於此際。此外，他又著了一本宋斯道益夫斯基評傳，都得到好評。後者雖然內容深些，但很受歡迎，不久已經再版，在一九二三年後，他因為和幾個經濟機關發生關係，他豐富了他那經濟學和財政學方面的智識，這時著有「經濟與基督教」。他又以其與當代文藝和詩人二十年來接觸的所得，著「德國現代文學」。一九二五年，他三十六歲，自此至死，完全擔任着文化政治的工作，他除作報紙主筆外，並在萊辛高等學校（Lessing-Hochschule）舉行演講，講題有現代人生哲學之基礎等。他又和廣播電臺合作，他播講的系統講演，有：現代精神生活的轉變，德國世界觀的派別，二百年來的青年運動，大都市的人，國家與社會的文化政治學，歐洲的精神機構等。他死的日子是一九三〇年四月二十號，這正是他創造力最旺盛的時候，不過四十歲。他的病，是腦病。照這傳記上說，他的影響不僅及於德國國家，民族，與文化，且更廣被於全歐。

友：這個勤快而活躍的學者之早天，的確是可惜的。無怪乎你說中國學者懶，至少比起這位學者來，我們是懶得多了。你爲什麼不找他一張像片也附在書上呢！

我：照我的記憶，他那現代德國文學一書裏，前面有一張像，是瘦長臉，眼睛鋒利得有些怕人的，可惜這書不在手頭了。不過也許我記錯了，是在這文藝史學與文藝科學的另一個版本上。我現在根據的是克倫諾袖珍本 (Kroners Taschen Ausgabe) 卷八十八，是一九三三年經過舒爾慈教授的擴充版，我卻還見過另一種。假若在北平，我到北平圖書館一查就可查得了，因爲我都是在北平見到的。就是那傳記，也還是虧得我記得在某書，所以才由弗朗克博士打來的呢。你知道，瑪爾霍茲死得太早了，因此，一般的人名錄上還查不到他。

友：我忽然想到一些瑣屑的問題。你譯的這部書，有沒有英譯本？

我：據我所知，還沒有。

友：國內有沒有人談到過它？

我：那倒有；楊丙辰先生曾有文介紹，名爲文藝——文學——文藝科學——天才和創作，發表在一九三四年我們辦的文學評論第一期，第二期上。楊先生的文章是刊完了，刊物卻因囊中羞澀而夭折。我之讀這本書，也是受了楊先生的啓發。當時文學評論的創刊，即以提倡文藝科學爲事，那發刊詞是我起草的，即全然以瑪爾霍茲的書爲依據。宗白華先生也很稱賞這部書，我之能完成這部譯稿，又是受了他的鼓勵呢。關於文藝科學，好像不是錢歌川，就是張夢麟了，他們有文章提到過。

友：你說得我又有些記憶了，你好像從前就譯過一點，並且發表過，不過期刊的名字一時模糊了。

我：一點也不錯，頭三章都譯過。第一章譯於北平，時間在一九三四年三月，發表在文學季刊第二期；第二章和第三章譯於濟南，時間在一九三六年一月，分別發表在上海的文學時代和南京的文藝月刊。發表是發表了，我卻不相信有人看。以下沒有發表，但我可以把翻譯的時地告訴你，第四章和第五章，都是在一九三七年

春季，譯於人心已經惶惶然的北平。這年抗戰開始了，我攜着這不急之物到了昆明。在昆明，我未嘗續譯，不過我會對文學院的學生作過一次講演，也爲的是希望有人對這方面有點認識而已。次年轉筑，赴蓉，來渝，這不急之物未嘗離手，可是沒去收拾它。後來同宗白華先生談起了，他鼓勵我譯完。今年春天，把第六章，第七章，以及跋文，附錄，統通譯就了，又通體一氣改了一遍，並加上附註，中間因爲病，因爲空襲，直到七月才算完全告竣了。

友：我看見你每回提到防空洞的，恐怕就是它了！

我：可不是？這也算隨我奔波，共我患難的老友了。因此我不肯辜負它，本文我至少看了五遍以上，譯稿我至少改了三次以上了。

（這時已近正午，抬頭一看，那對山上已經掛出預行警報的紅球來了，因爲天氣正好，萬里無雲，恰是暴敵施展屠殺民衆，摧毀文化的好時候。）

友：我要告辭了，我回家還要收拾東西，我的太太也要我給她買麵包呢。

我：那末，我就不敢留你了。

友：（在我送他出門的時候，他忽然又回頭來問我）；你說中國過去就沒有文藝科學麼？

我：也可以說有，像馮浩那樣費三十年的功夫專門研究李商隱的，也就夠文藝科學的精神了。德國舍洛這一派語言學家的的工作，也很像中國清李乾嘉的樸學。假若有機會，作一個比較，或者也找一找那內在的趨勢，一定是一個好題目。

友：今天的談話很有意思。文學也是「學」，是專門之學，是一種科學……理智的硬性；……我們民族需要肯定自我與意識自我。……都還在我腦子裏迴盪着。一會到防空洞裏再談！防空洞見！

我：防空洞見！

一九四〇年八月六日，長之記於渝郊

附 宗白華先生跋

德國學者治學的精神有它的特點；一方面他們都富於哲學的精神，治任何一門學問都鑽研到最後的形而上學的問題，眼光闊大而深遠，不怕墮於晦澀艱奧。另一方面卻極端精細周密，不放鬆細微末節，他們缺乏英國人的丰度瀟灑，也不及法國人的一清如水。李長之先生譯的這本極有價值的學術著作，也具有這特色。李先生自己的文章向來是簡勁明晰的，所以譯了這本德國書以後，生怕人家說他晦澀，寫了這篇明白曉暢而流利的長序（對話體），替這心愛的譯本辯護，中國所譯歐美專門學術的著作本來就不多。譯了出來也不容易出版。（愈專門愈有價值愈不容易出版。李君此譯幸喜有識的商務印書館已接受了。）李先生譯了這本有價值的中國還很缺少的文藝科學的名著，還要替自己及原書寫辯護詞，我是有點感動的了。

譯者序二

現在付印的，是一個重鈔本。第一次鈔本，已因香港的失陷而沒有下落。感謝聶靜涵小姐，她分擔了我這乏味的工作——鈔寫——的一半，她是那樣熱心，常工作到深夜，甚而到天亮；也謝謝王雲五先生，雖然在這樣物力艱窘的局面下，但他竟毅然第二次重又答應付排，並且願意提早印出，更為俯就我的意見，改排了大本。這書如果真能順利問世，我不能忘掉這些好意和機緣！

在我重校這部譯稿時，又發現了原著的一些優長：第一是，富有生命力，有些地方簡直很潑辣，驕悍；第二是，句子的組織真令人羨慕，我深感自己的譯文便叨了原著的光不少，試看自己離開原著而寫的序文就那樣平滑而細弱了；第三是，作者有可驚的綜合力，每在一章或一節之首尾表現着。

通常一部著作在二次整理時，往往不免有些欠缺或不得不苟簡之處，這回卻很幸運，和上次鈔稿並沒有什麼不同，雖然稿紙的資料是粗糙得多了！

這次的鈔稿，幸還沒遇見警報，但是氣溫每在百度以上，令人夜間不能就寢，白晝就想昏睡，於是也費了不少掙扎。——因此便更覺得靜涵的毅力是可感並可佩了！這是讓人一想到大小事之成，在靠機緣之餘，卻又免不了一些艱辛處。

最後，上次序文中所說的介紹文藝科學的一文，已經查出，作者是錢歌川，題目是文學科學論，現在收在現代西文學評論（中華版）中。據作者的跋，這是一篇譯文之類，只是沒有註明出處，不知爲什麼。

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七日，長之再記於滬郊

原著者序

這一本關於最近的德國文學史之方法的書，將首先給教者和學者以現代正在作用着的精神力量之一種概念，並給他們展開關於方向的論爭之一瞥。但這卻不是用一種撮要式的無所不包的方式所能作到，反之，乃是只有由對於目前的研究工作中之最重要、最有意義、最有決定力量的部分，加以意識地選擇並限制於此而後可。因此這就不能不用極緊湊的篇幅去歷史地敘述老一代的志願與貢獻，以便把新一代的知識與成績能夠提出來，好與之相對照了。

這本書更有一種企圖，就是想對現代文藝史的方法論上之混淆與紛亂狀態予以澄清，並想藉此對我們這一門科學之樹立根本的課題上有所貢獻。因此，這本書是按照一種方法論的可能性之體系的次序並根於一種哲學的觀點之指示而排列着的，這一點希望讀者必須明瞭，以便對各種方法可就其彼此關係及其交互限制之處而觀察之，且可就此方法論的見地而衡量之。

這本書最終則殿之以我們精神現狀上之當如何明朗與如何確定的討論，這是就文藝史——它在現代直然是民族生存以深刻的震撼的——之不只有一種學術的任務，而且有一種精神政治性(Geistespolitisch)的任務言而然的，我們希望自這文化政治(Kulturpolitisch)的目的出發而新生命與新課題予以獲得。

不待言，本書的主旨並不在對這一門科學的文獻給出一個目錄學式的或別種鉅細不遺的鳥瞰來。那無數的有價值的而且必要的專門研究，只要它與方法上的建立無關，我們是不觸及的。本書亦不以致力於文藝科學之科學性的歷史或文藝科學之專著的特別研究為職志。本書所注意者，只在將我們這一門科學之內在的趨勢(Die Innere Tendenz)於光天化日之下(al fresco)描繪出來而已，只在將此種科學於西方的學術危機、特別是西方的精神科學的危機之際，舉之於意識之上，由是而希望或可有所釐清，有所影響而已。

人們在這裏應該承認學術上有這樣的事實吧！就是所有學術上之主要的成分假若不論方法而只論對象時，是在僅次於精神的或物質的實在（Wirklichkeit）之統治力量之下，而對於個人有着一種極大作用的，這些個人正爲他們所欲理解和所欲充實的（工作上的）愛情（Eros）而努力着，他們並視此種愛情若爲生命上及觀念上最神聖之物然；假若在這門研究中對學術性的探求與自覺的愛情能夠喚起，且能傳達之於讀者，那末作者的努力便算是不單沒有落空，而且已經獲有無上的酬勞了。

一九二二年十月，外爾諾·瑪爾霍茲（Werner Mahholz）序於柏林施泰格里慈（Berlin-Stegitz）

第二版校訂者序

由於書局裏的主人之請，我擔任起校訂瑪爾霍茲的書的工作來，爲的是使這在一般讀者間和學者間已經流行的書更有些生氣而已。關於我在這校訂工作中所根據的基礎和必要性，我是說明在跋文裏了。

一九三二年七月，弗朗慈·舒爾慈(Franz Schultz)記於佛朗克府(Frankfurt)